

民国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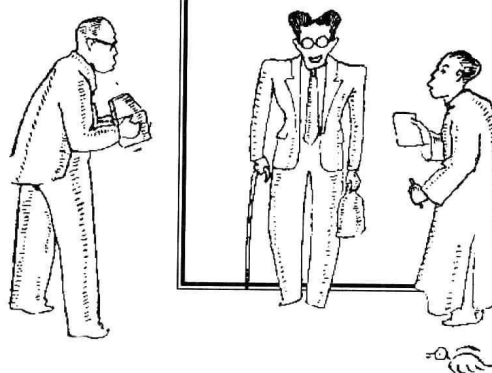
大陆上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玩什么？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
 民国时期的生活，是一个夏天，一件东
 刚才还一脸烦恼的姜德全，神情也难得的舒
 官而且抱病在身的周学熙，但见香烟缭绕，
 期间，民国最初的财政规模和法规法章，大
 央政府实行的国家税与地方税的划分，中央
 内容，周学熙当年都曾设想过，有的早年更
 中国财政第一人的周学熙，因为眼瞅着袁大
 久，
 肖伊非著
 著再谈国政事，真病也累
 养望，当然，已经辞官而且抱病在身的周学



民国表情

肖伊绯——著

MINGUO BIAOQ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表情 / 肖伊绯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95-3195-0

I. 民… II. 肖… III. 文化—名人—列传—中国—民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388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开本: 720 mm × 990 mm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50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3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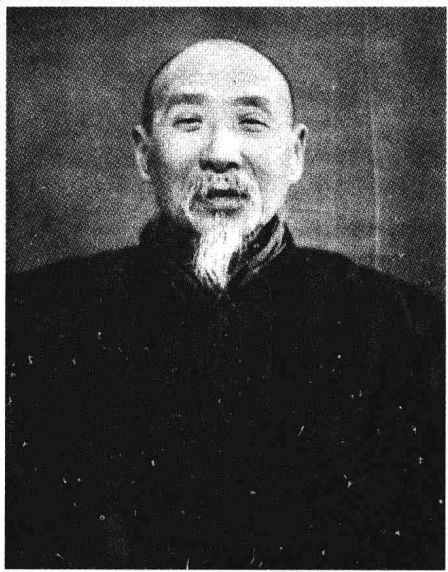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275	程砚秋	红拂外传之外
261	童斐	探寻中国音乐之源
239	梁思成	化城，化为乌有的城
223	马叙伦	庄子的时髦
203	钱穆	梦里“周公”知多少
177	吕澂	不负如来不负经
151	熊十力	未竟的哥白尼革命
139	顾颉刚	伪书伪史伪科学
119	胡适	这本戏和那本戏
105	陈垣	基督教徒的信仰与学术
087	林语堂	子见弟子及其他
063	黄节	凌波微步在1920年代
043	周叔致	一个人的养生学
023	丁辅之	铸成大雅
001	周学熙	恰似一江春水自然来

目录

359	339	321	311	297
陈柱	朱谦之	周作人	俞平伯	马廉
最后一位「新经师」	潮来潮往，一个情字	「雅言」疑案	一杯周作人，一杯朱自清	不登大雅亦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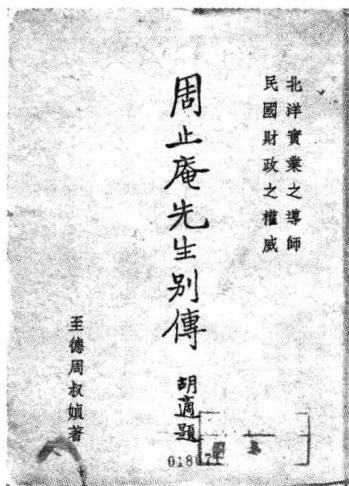
周学熙

恰似一江春水自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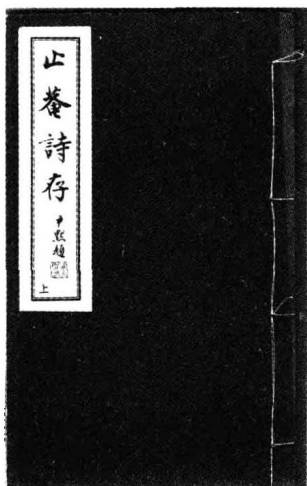
小引·救火

1891年1月16日，紫禁城外贞度门发生火灾，火势延伸至太和门。宫廷内外，纷纷传言这是天心示警，为人怨天怒的不祥之兆。御史们抓住时机，群起谏议，要求慈禧太后“居慈宁宫，节游观”；可惜老佛爷一句话，所有刚刚还义正词严的官爷们统统被革职，永不叙用。皇宫里大火冲天，一帮食国家俸禄的大臣不去救火，不去思索长治久安、免于火灾的良方，却借题发挥要削减主子的消费，难怪太后不满意，窝了一肚子的火。

这一次著名的“火灾”，在清宫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因为这是一场发生于光绪皇帝大婚前不久的“天灾”，故而被载入史册。据《清宫述闻》记载：“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太和门火。明年正月二十六太婚，不及修建，乃以扎彩为之。”这次火灾发生在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先从贞度门起火，是两名值班太监使用灯火不慎引起。贞度门在太和门之右、太和殿之前。起火后扑救不力，延烧到东西朝房、太和门和昭德门。此次大火烧了两天，虽经扑救，东西朝房和太和门还是被完全烧毁。那些放在临时库房里，准备为光绪结婚大典用的各种服饰和礼仪用品，全部被烧毁。



《周止庵先生别传》，由其女周叔嬭编著，胡适题写书名。此著述曾作为周叔嬭燕京大学硕士论文。



周学熙纪年诗总集《止庵诗存》

为什么堂堂皇宫会发生如此大火呢？这主要是因为平时缺乏防范。值夜打更的是两名六十岁开外的老太监，值班时偷懒睡觉，待被惊醒时，火已熊熊成势，再无法收拾。而且当时正是寒冬时节，内金水河冰冻三尺，凿冰取水救火，延误了救火时机。太和门是木结构建筑，着起火来燃速极快，且坡顶建筑扑救更为不易。深夜起火，又无照明设备，救火更难。在火势向四处扩大蔓延时，大臣们合计，派工匠先把尚未燃烧的近火之庑殿，在梁柱上拴上大绳，派众多士兵用力拉，把庑殿拉倒，然后在上面浇水，断绝火道，这才阻隔了火势蔓延。据文献记载，为了扑灭这场火灾，清廷动用兵士、工匠等 7000 余人。

这场大火之后，皇宫的消防救火问题，才开始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当然，已经烧掉的太和门，没办法赶在皇帝大婚前重修，只好派人把火场打扫干净，找来棚匠，支搭临时席棚，扎彩张灯，勉强办了婚事。这临时的棚架，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祭扫时，烧掉的纸扎诸物，既不牢靠也不吉利；亲眼看到的和后来听说的人，心里都会觉得不自在。毕竟皇家婚礼这么一场关乎国家体统和颜面的大事，就这么草草了事，谁心里也会觉得不舒服。大臣们在这个时候给老佛爷添堵，当然只会自取其辱。

绝不给老佛爷添堵添乱，只会拼命给老佛爷办事邀宠的袁世凯，在后来为皇宫消防献计献策，推荐出一位得力能干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为“北洋实业之导师，民国财政之权威”，他就是周学熙。

1. 铜板、银元、财神爷

周学熙(1866—1947)，两江总督周馥的第四个儿子，光绪大婚前那场大火时，他刚满 25 岁。16 岁就考中秀才的他，此时还在寒窗苦读，争取能够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1894 年，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他却终于考中举人，在浙江为官。1898 年，戊戌变法那一百天的维新，死掉六个君子；他却开始接触国家能源开发与管理，派为开平矿务局会办，次年升总办。受其父周馥的教诲与影响，在这位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 30 年的“老洋务”引导下，周学熙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与一般热衷仕途、钟情诗文的文人迥然不同的道路。他走的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实业探索之路，决定了他的实干与实际，这种实心实意的人物，是注定要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干出一番实绩来的。

1900年，在义和团装神弄鬼、刀枪不入跳大神那会儿，在八国联军以铁枪钢炮洗劫北京，逼得老佛爷、光绪皇帝逃出京城时刻，周学熙正是山东候补道员，入袁世凯幕下，后随袁到天津，开始主持北洋实业。他不相信念咒语能“扶清灭洋”，也不认可“崇洋媚外”，他还是坚持洋务派的一贯作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传统他恪守了一生，分得很清楚，走得很坚决。或许，当时的守旧派认为他是“洋二代”，而后来的革命派又认为他是“旧二代”。总之，他就是那种始终有点逆潮而动的年轻人。

正因为逆潮而动，才不会随波逐流，才可能成为弄潮儿。越是危急的时刻，像周学熙这样的“老实人”才有可能顶风而上，脱颖而出。他第一次出场的背景很简单，还不是为皇宫救火，这茬儿比救火还急。原来，大清帝国的皇宫经过1900年那一场“庚子国变”，彻底没钱可用了，那时并没有什么御用经济学家做个曲线图、饼状图啥的分析一大堆，更不可能有什么银行高参来做货币决策模型、信贷调控指数；铸多少钱、怎么铸、怎么用，都需要有人站出来拍胸脯，一个人承办。

这个时候，谁能站出来？袁世凯。他为什么能站出来，因为在他站到慈禧太后跟前拍胸脯之前两个多月，36岁的周学熙已经站出来立了军令状，这会儿正甩开膀子在铸钱炉子边上等着一炉一炉的铜钱出炉哩。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是因为中英贸易逆差太大，禁烟令让特别想靠鸦片捞银子、拉近差距的英帝国恼羞成怒，才最终与清廷交火开战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如此，后来的“庚子国变”更是如此，除了英帝国之外，法、德、俄、意、美、日、奥等，哪一家都想来中国捞银子，捞不够了、捞不着了，就扯下“公平贸易、文明竞争”的遮羞布，从偷骗改作了明抢。

真刀真枪干起来时，洋务派打了败仗，守旧派也并不能因此荣光。出卖过维新派的袁世凯啥“派”也不是，只管帮着慈禧太后堵各种各样的窟窿、解各种各样的疙瘩，他的地位如何，取决于他的有用程度，而不是党派阵营。换句话说，除了老佛爷，他在哪一派都不受欢迎；只有一个老佛爷，比她亲娘还亲。

他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政见和惊世骇俗的手段，善于救场就是他救自己的法宝。比救皇宫的大火更急，刚才班师回宫的老佛爷，正面临着国库被劫掠一空的局面，闹起了银荒，这会儿需要有人出来支招，解这个没银子可支、没钱可用的燃眉之急。

1901年，袁世凯被紧急从山东调至直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离开山东之前，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制造货币、整顿金融。这不仅与整个经济界有关，也关系到袁世凯能否巩固他的政治地位。袁世凯走之前，给周学熙撂下一句话：“我走这趟，个把月之后就回来，希望到时能看到铸出来的新钱。”至于铸多少，怎么铸，并没有过多的交代。周学熙心领神会、眼明手快，把经济学家、货币政策专家、国家银行行长、造币厂厂长、冶金局局长、工艺局局长、图案设计专家、车间主任等职位的活儿一肩挑，迅即组织人马，开工铸钱。

周学熙四处勘察，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并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等到新钱出炉时，大家又发现了一桩奇事，中国人用了两千年的圆形方孔的铜钱，从周学熙炉子里出来时，却全都没有了方孔，圆乎乎的铜板一块，这是咋回事儿？难道机器出了问题？

等到袁世凯回来验收工程进度时，这样的铜板已经铸出150万枚。袁大人把铜板拿到手里左瞧右看，啧啧赞叹。铜板正中分为双圈图案，里圈内印着“大清铜币”四个上下左右撑足面子的端正大楷；外圈里上方印“造币总厂”，下方印“当制钱十文”。

原来，这一枚铜板就能当方孔铜钱十枚的价值使用，这150万枚铜板就相当于铸出了1500万枚铜钱。这个新发明，不但缓解了市面上流通的钱荒，更重要的是，帮助政府解决了国库无银根的狼狈局面，多开了一种变相国债的途径。袁世凯拍板定案，就这样继续弄，不但要搞“当十文”的铜板，“当二十文”的也要弄，弄得好了，以后直接开铸银元。

很快的，这样的铜板开始风行于世。铜钱一文两文的古老流通法则，一方面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变得困难；一方面又因周学熙的铜板救市，变得更加不合时宜。从周学熙的“当十”铜币铸出来开始，人们习惯于使用铜板，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整个过程，前后也不过就四五年时间。后来，一枚当二十文使用的铜板也给铸了出来，当十文的铜板又逐渐退出流通；等到卖报歌唱起来“一份铜板就买两份报”，那个时候的铜板已经是一枚当百文制钱流通使用了。

等到重库平七钱二分作“壹元”使用，也就是当制钱一千文的“银元”铸出来时，大清帝国开始摆脱银两、铜钱的传统货币计量单位所带来的国库空虚、交易



大清铜币当二十文正面(左)、反面(右),宣统年制。

繁琐的双重束缚,终于可以喘一口粗气了。袁世凯的胸脯再一次拍到了老佛爷的心坎上,周学颐的名字也像铸钱模子一样刻铸在了中国货币史之上。到1907年3月,天津银元局各造币厂共铸银元571万多元。由于银元式样新颖,便于携带,人们都乐于使用,因此北洋银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国金融势力的扩张,缓解了国内银根一直紧张的窘迫状况。

就在周学熙铸出铜板的那一年,1902年,为了维持银根奇紧的天津金融,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初为平市官银号),发行铸币、管制金融市场,并且准备以此为基础,联合绅商合股开设“天津银行”。筹措资金时,袁世凯试图不让官方出钱,只用商人们的钱开办银行,自己好从中渔利,结果绅商们都借故退出。袁世凯转而求助外国银行,结果也遭到拒绝。

这时,周学熙又站出来,提出天津官银号添设储蓄业务和商务柜,经营官民的存款业务,吸收社会游资,扩充官银号的资本,同时商务柜开办经营工商业的贷款、贴现和汇兑业务,并且发行银钱票。袁世凯在前边救了大清帝国的场,周学熙则在后边实实在在地给袁大人撑足了场面,保住了脸面。

袁周两人携手的“二人转”,迅即玩转全国。即将崩溃的大清帝国,在行将就木的最后几年时间里,货币政策与财政管理初见起色,也因为周学熙的勇于承担、锐意变革,帝国经济有了回光返照的喘息之机。

周学熙被任命为官银号督办之后,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定人员,明职责,待遇与资格挂钩,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层层负责的责任网,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事业单位的模

板做榜样，在工作效率方面也颇有引导之力。

周氏还编订了官银号各项规则八十条，这些“天条”似的行为准则，使原本人浮于事、却又根本干不成事的所谓“事业单位”，开始有了现代化的效率评估机制；这在老佛爷还在的时代，无异于“理想国”。这八十条规定，现在看来，也显然是普世准则。例如在办公时，以公事为主，不准闲谈，即使休息时，也不许高谈阔论，干扰他人行事。为了确保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改组后的官银号还规定每年“官本所得息银，除准允督宪提用外，其余一切官本、护本、公债及各项存款，无论何次公用，永不能提支”。另外，无论是公司、局、所还是商号前来借款，必须先查明有无偿还能力，如果没有确切的偿还保障，概不出借。这条规定十分重要，它禁止了军政各方的硬性摊派和人情贷款，使银号避免了大量的呆账。

经过周学熙的改组，官银号扩大了营业范围，增加了营业项目，活跃了市场金融的周转流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直隶工商业的发展，成为直隶省重要的金融枢纽。袁世凯对周学熙格外嘉许，后来把北洋政府的行钞、铸币、财政、金融大权统统交给他掌管；还把自己的侧面“玉照”交给他，后来铸成了硬通货“袁大头”，其银币的工艺与成色至今还令收藏者们趋之若鹜。



民国三年铸造袁世凯像银元，后世通称为“袁大头”，为中国银元流通史上最常见银元。此为试铸铜质样币正面（左）、反面（右）。

周学熙成了真正的“财神爷”，在晚清最后几年和民国最初几年都是如此，那些琳琅满目的铜元、银元就铭记着这段历史，俨然一部《财神传》。

2. 自来风与自来水

俗话说，救急不救穷。周学熙不但救了袁世凯的急，还救了袁世凯的穷。他的救场功夫，间接地也救了大清帝国的老命。袁大人念着他的好，老佛爷也听说了他的名儿，可国运衰微、自顾不暇，想提拔他暂时还有心无力。

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的一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不久前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调升进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尚书的袁世凯。袁世凯进殿不久，就有一小太监匆匆来报，说宫廷某处失火。联想到光绪皇帝大婚前的那一场大火，老佛爷心头火起，蹭蹭地往上直冒，一脸的不痛快。

已经十六年过去了，一大帮拖家带口吃皇粮的京官，一大堆满口先祖遗训忠良世代的大臣，竟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替帝国分忧的消防方案。大火不知哪一天又要窜进皇宫大烧一把，火灾的隐患如同各地的乱党一样，让帝国掌舵者有点不知所措、力不从心了。

两年半前，即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胡汉民、张继、陶成章、章炳麟、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宋教仁这群绝大多数都很年轻的新生代，借着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更首次揭示“三民主义”，公开、明确的反对帝制，要求民主。1907年，徐锡麟趁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之机，从容拔枪击杀安徽巡抚恩铭，随后英勇就义；这一年，光复会起义失败，秋瑾从容就义；这一年，四川同盟会原定在慈禧寿辰之时起义的计划流产；这一年，孙中山筹划的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相继失败，但在年底，他又发起镇南关起义，并亲自向清兵发炮。各地的炮火比这眼前的火灾还要厉害，早乱成一锅粥了。

这一年，该改的都改了，能革的也革了，只剩下没把皇帝拖下金銮殿，只差没把老佛爷送西天。面对前来报告火情的太监，慈禧太后连摔杯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只管坐在原地，自顾自地叹气。望着刚升任的新官，她也只是例行公事的随口一问：“防火有何良策？”没想到，袁世凯精神抖擞，立即回答：“以自来水对。”

老太后满脸诧异地望着袁世凯说：“就是那‘洋胰子水’？”袁大人满脸真诚，连忙答道：“正是正是。铁管铺设、阀门管制，这水说来就来，说闭就闭，扑火消防很是方便。”其实，老太后是早就知道这玩意儿的，谭嗣同一伙还在闹腾时，就向光绪皇帝鼓捣过，要在皇宫里设铁管水塔，搞这个破坏龙脉风水的自来水。

当时，就被她呵斥了一番，这会儿袁世凯又来提这档子事，究竟是中了什么邪？

实际上，早在 1879 年，大连就修建了自来水管。随后，一些受西洋现代化风气影响的沿海沿江城市，如上海、青岛、天津、广州、武昌、汕头等，也相继兴建了自来水设施。天津在 1903 年有了自来水，袁世凯深知自来水的种种便利，加之又亲见其架设建造之快，因而胸有成竹；这一次看到太后如此烦恼，遂斗胆又建了一言。

老太后未置可否，只是说：“谁可担此大任？万一洋人要通过这根铁管子下毒怎么办？”袁世凯当即向她推荐了周学熙，拍胸脯保证：“此人来办，万无一失；甭管是中国人还是洋人，他都搞得定。”老太后又问：“就是那个铸铜板、银元的秀才吧？”袁连连称是，看着正在里里外外挪置物件的太监宫女，他突然指着一个铁物件说：“瞧，太后，这电风扇还是他给送过来的勒。”

袁世凯说的那物件，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把电风扇，由天津劝业铁工厂生产制造。虽然它不一定是中国第一把使用的电风扇，可于 1906 才筹建的天津劝业铁工厂，在周学熙的创办和运营下不到一年工夫，就已经生产出许多民生日用机械，包括织布机、石印机、起重机和电风扇。

在此之前，天津的利顺德饭店，早在 1897 年，从欧洲进口了一台大马力发电机，开始自己发电驱动国外进口的电扇，成为中国最早能“自来风”的高档饭店。那时候，中国市场行销的电扇主要就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奇异牌，“奇异”二字是取自它的英文商标 ce 的谐音。后来，又出现了德国西门子、美国三角、日本 KDK 等国外的品牌，洋人的“自来风”迅即吹遍清帝国的豪门大宅。

老太后虽然早已听闻大臣富豪们流行着这些“洋玩意儿”，可她自己还真没去试过。毕竟和“自来水”一样，这“自来风”的铁片子会不会破坏龙脉风水，她心里总还是没底儿的。直到袁世凯送来一把国产的“自来风”，让她好好的凉快了一个夏天，对这件东西，她还是印象颇佳的。袁世凯在她眼前提起这事儿，刚才还一脸烦恼的老佛爷，神情也难得的舒缓了一点，连连说，好东西，挺管用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前后，京城又接连发生了几起火灾，由于运水扑救不及，和皇帝大婚前那次火灾相仿，基本烧得精光。当年 4 月 18 日，农工商部熙彦、杨士琦等上书慈禧皇太后、光绪帝：“京师自来水一事，于消防、卫生关系最要，叠经商民在臣部穹请承办。”并奏请由农工商部议员周学熙主持自来水事务。

慈禧下旨，准依“官督商办‘通例筹办’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用”。农工商

部的大臣接到了圣旨，立刻再次上奏折，请示筹办的“大概办法”，建议成立“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性质为“官督民办”，并建议任命周学熙为公司总理（相当于今天的董事长）。



京师自来水公司股票，票面署名“总理周学熙”。

当年 42 岁的周学熙，就这样在一纸任命下，在众多大臣们的追捧下，从天津赶赴北京上任。他并不精通供水工程，但凭借对国外近代工业文明的了解及多年创办实业积累的经验，奉旨进京后很快拟就了《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大概办法》。

公司“定名为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一切按照公司商律办理，以符名实”，并确定公司为“官督商办”，以股份制募集建设资金，拟定募集 300 万银圆，分 30 万股，又规定“专招华股”，以保护民族企业权益。当时京城的各大报纸均刊登有白话广告一则：“我们公司办这个自来水，是奉皇上旨意办的，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不是净为图利啊。只因水这个东西，是人人不可离的，一个不干净，就要闹病，天气暑热，更是要紧。所以开市以后，凡是明白人，没有不喜欢这个水的。”

可惜，享受过“自来风”的慈禧太后，没能最终享用“自来水”。光绪三十四

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隔不足20小时相继“驾崩”。还正在铺设管道的自来水公司人员,接到命令立即停工。内城巡警总厅要求自来水公司将出殡线路地安门、西四牌楼、阜成门沿线立即修理平坦。公司调动人力突击埋管,来不及埋管的,将土回填,垫平夯实。直至宣统元年(1909)二月底出殡后才复工重新挖沟,又耽误了好几个月。即便如此,不到两年的时间,周学熙的自来水公司就于1910年3月,正式向北京城区供水。

不到一年时间,制成“自来风”;不到两年时间,达成“自来水”,这就是周学熙的能耐。不管周家的“风水”究竟如何,能不能如“自来风”、“自来水”这样,这么快、这么猛;但周学熙的实业力量已经开始展现威力,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机遇中,无疑已经具备了翻云覆雨的实力。

3. 山、海、经中“诗生活”

民国四年(1915)的冬天,周学熙生了一场大病。年已50初度的他,第二次辞去了“中华民国财政总长”的职位,一个人静静地在北海公园一处小宅院里养病。



北海濠濮间旧影

这一年冬天,在北海公园一处叫“濠濮间”的地方,周学熙写了一首诗,由此

拉开了他此后长达 32 年“诗生活”的序幕。从这一年开始，他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诗作被保存了下来，在他死后辑为一部诗集，称之为《止庵诗存》。

作为“诗生活”开篇的第一首诗，1915 年冬写成的这首诗，题目很平实，“养病北海晚饭后散步”。这首诗的文句，就真像一位在公园黄昏里散步的老人，偶遇之后絮絮叨叨讲出的往事，平实无奇。读这首诗，和当年的“自来风”与“自来水”已无瓜葛，与两任财政总长的显赫与失意似更无关涉。诗曰：

历朝临幸地（所居在北海之东岸，小山巅三楹曰崇椒；又山半三楹曰云岫；又池边三楹曰濠濮间，皆乾隆时额），容我短藤拖。池小桥添曲（山北有小池不盈亩，石桥界其中凡九曲），廊回路失坡（山上下回廊相属，凡十数折，无登陟之苦）。晴皋残雪少（今春极暖，雪极少），高树夕阳多（山居太液池岸东，故得夕阳之多）。何处清笳起，苍茫发浩歌（苑内驻拱卫军后路各营，因川滇有事，操练极勤）。

全诗几乎每句加一注解，五十年来忙于实业创建的周学熙，似乎此刻才开始认真地观赏起人生的风景种种。他每至一处，皆细心体会与品味那些曾经司空见惯，甚至熟视无睹的景致。北海公园是他在老北京再熟悉不过的去处，病中的他，此刻看公园诸般景致，都是熟悉中透着一股陌生的。最后一句的注解，还是可以看到曾担任两任财政总长的他，对政务军事的熟悉以及对时局的忧虑。注解中提到的拱卫军，实则是宣统三年（1911）秋，清廷成立的一支守卫京师的新军；初驻河南，随即调驻北京。辛亥革命后，隶属北洋军阀袁世凯，并有扩充。此刻的操练，显然是针对蔡锷在滇军中发起的反袁运动（史称“护国运动”）的。

当然，已经辞官而且抱病在身的周学熙，但见狼烟滚滚、你争我夺，却早已心灰意懒、无心奔走了。虽然他在担任财政总长期间，民国最初的财政规模和法规规章，大多经他一手操办，论成就及威望不亚于开国元勋。譬如，中央政府实行的国家税与地方税的划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不同性能作用，公债发行、税制整改等内容，周学熙当年都曾设想过，有的在早年更是实施过。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实践角度，都堪称现代中国财政第一人的周学熙，因为眼瞅着袁大总统即将复辟称帝，自知这“中华帝国”的国运并不能长久，遂袖手而去、不再过问政事。真病也罢，假病也罢，终归是一块心病，须得摒除干扰，静心休养罢。